

呂錫琛 著

道家、方士
政治与王朝



吕锡琛 著

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

【湘】新登字001号

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

吕锡琛 著

责任编辑：李建国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字数：289000 印数：1 —— 3100

ISBN7—5438—0231—7

D·51 定价：6.60 元

序

1985年11月，在我的故乡湖南湘潭召开了首次全国老子学术思想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突出地提出并讨论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针对海内外颇为流行的“儒家主干说”和80年代重新泛起的“复兴儒学”的主张，部分学者根据历史事实，在会上大讲“儒道互补”，并明确提出了“儒、道两家思想共同构成了多源汇流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主干”的论点^①。在会上、会下和会后，这一论点得到了众多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的认同。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学术主干问题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以陈鼓应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进而提出“道家主干说”^②，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在讨论中，这种观点亦被批评为“多少有些偏狭”^③。“儒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和“儒道同为主干说”，到底哪一说更符合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呢？这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明确批判继承的任务，改造“国民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很有必要就此展开深入讨论，以推动中国文化的研。

在湘潭会上，我读到了不少好文章，包括湘籍青年女学者吕

① 参见《求索》1986年第1期。

② 《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

③ 《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

锡琛写的《老子思想与贞观之治》一文。该文以唐初贞观君臣之言行等大量思想素材，具体而清晰地说明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对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取得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国泰民安的积极社会效果。汉初有“文景之治”，唐初有“贞观之治”，宋初、明初君主自觉推行道家的治平之术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类似的社会效果。那次会议上的许多论文，还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思维方式、人生智慧等各个方面，具体论述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其某些消极的影响，这种多面展开的具体、专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很有益的。

我读了吕文之后，当时还谈过另一点感想，就是它启示我们：思想史研究应注意和社会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列宁曾经说过：“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①这说明注意对思想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演进，对概念、范畴之辩证发展和运用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思想、观念的源泉只能到客观物质世界和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一经产生，又会对社会存在发生反作用，促进或者阻碍社会的发展。从思想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反作用这两个角度，我们都应特别注意思想史和社会史之间的联系，通过社会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等等的研究，去说明一种思想、学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何以必然产生，它所反映的社会物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质生活内容是什么，它在后世产生过何种影响和作用。这些都是就思想谈思想、对它进行纯逻辑的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思想史研究者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更多地学习和积累社会物质生活史和政治史等方面的知识，加强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这对更好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科学地说明各种思想史现象是有重要意义的。

湘潭会后，吕锡琛同志循着思想史和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路子，就道家、道教、神仙方术和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经过几载辛劳，终于写成一本近30万字的专著。这一课题前人还没有做过，研究起来有相当的难度，本书作者表现出了勇敢的探索精神，不仅敢探新路，而且多有不同于前贤的见解发表。本书所说的道家，沿袭传统习惯包括道教在内，而道教和从古代巫术演化而来的神仙方术又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本书作者指出，曾经被当作儒家学说之一部分的天人感应论、灾祥说和谶纬迷信，事实上与这派学说更加接近，谶纬乃是从方士的思想、信仰、方术过渡到道教经书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和神仙巫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错综复杂的互相渗透和溶合关系，作者认为董仲舒的新儒学实质上即是一种“以巫史、方士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为核心和骨架，以儒家君臣父子、仁政德化观念和黄老道法自然、君道无为宗旨为血肉”的“三合一”的思想体系。这些见解对于认识儒、道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疑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至少是提出了很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由于本书论述的对象包括道家、道教和神仙方士的活动，道家中既包括老子、庄子的学说，也包括黄老新道家的理论，因此在考察其对封建王朝政治的影响时，作者十分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论述其正、

反两个方面的效应和作用，一切结论都以充足、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力图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我认为在其学术研究起步时所表现出来的学风是良好的。

本书是中国道教文化研究的一项颇具特色的最新成果，它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关于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它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对中华民族心理和性格形成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我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多优秀的专门研究论著问世。

方東立

1991年8月20日

前　　言

本书所说的道家，包括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及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

道家和道教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王明、任继愈、王沐等先生早有论述。但是，《道德经》中由于包含了个人修炼以及某些神秘体验的内容，故在道教的创立过程中，被奉为基本经典。这样一来，原本不是宗教的道家，就被染上了宗教的神秘色彩，而作为思想家的老子，也就被奉为道教的始祖和尊神。大约从六朝时期起，道家和道教被统称为道家。宋元仍沿袭这一名称，而以“本”和“末”来区分二者^①，这本身又反映出二者难解难分的历史状况。据此，本书仍然沿用历史惯例，将道家和道教统称为道家。

道家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化学、经济、天文、地理以及性格习俗、农民运动等方面，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古代帝王的政治生涯中，更留下了它们的巨大投影。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

① 宋代苏轼说：“黄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元代柳贯说：“道家者流，以清静为宗，祛禳禁醮其末也。”（《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一七）。

而解”。①此可谓一语中的。

方士是道士的前驱。但在道教形成之后，仍然有一些方士并未取得道籍，成为道士，他们广泛地活动于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因此，与道教相比，方士影响社会生活的时间更为久远，方式更为多样。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道家、方士的这些作用，或者被有意无意地掩盖、歪曲，或者被加以夸大和神化，因此，当人们注目于这些问题时，总是感到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神化道家、方士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无疑是荒谬的。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这种观点早已不攻自破。不过，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是：究竟如何看待道家、方士的历史地位？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儒者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道流人物则远离政治，他们的人生态度是出世的，他们只知独善其身，不关心国家的命运，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道家主张愚民政策、阴谋权术，宣扬无所作为、消极退让的懦夫懒汉哲学，对中国历史仅起着消极的影响，而道教神学、方术则纯粹只是麻醉、愚弄人民，道士只会斋醮祈禳、求仙炼丹，他们无非是李白、林灵素一类的骗子。

持有这些看法，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未必是全面的。事实上，道家、方士对于王朝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道家人物中，尽管存在着庄子、列子这类意欲逍遥游、御风行的出世退隐派，但他们也只是道家中的一派，道家学派中更主要的成份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学派以及后来的黄老新道家。而且，即使是退隐派，也不是绝对的退隐，完全不问政治。他们的隐居行为本身就是对于

① 《致许寿裳》，《鲁迅书信集》上。

黑暗政治的抗议，其中不少人是社会批判意识的承担者^①。我们还应看到，当政治气候有所改变时，隐者中也不乏复出从政，一展其济世安民之志的人。有的道士则强调，应当先“匡济帝王，解除祸患，使国宁民安，然后乃得隐靖修学。”^②至于道家学派中以老子为代表的一派以及后来的黄老学派，则更是深切地关注政治，为统治者构设出一套社会管理之术。老子的一些思想虽然也曾被一些庸主昏君作为怠惰纵恣的借口，但从其主流来看，这套理论不仅在历史上为治国安民发挥过积极作用，而且还走向世界，在现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勃发出它的生命力。例如，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就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老子》英译本成为美国的畅销书；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的企业也将上面这句话和无为而治等思想作为重要的管理原则。同样，方术、神学既可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他们愚弄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又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统治者自身，使这些人间至尊的君主不致于毫无顾忌地滥施暴政。君主溺信方术，常常导致朝政腐败，权奸当道，身败国亡，而方术神学一旦为某些进步政治势力所利用，则又能在推翻腐朽王朝或战胜腐朽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发挥鼓舞人心、号召群众的作用。而在道教的门下，既有隐遁修炼之士、装神弄鬼之徒和虚妄妖邪之术，也有经世济民之才、治国安邦之策和救死扶伤、健身强体之道。不少道教经籍在宣扬宗教神学的同时，也针砭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些治世安民的主张。

因此，从貌似出世的道家理论和充满宗教神学的道教经典中，

① 见萧萐父《道家·隐者·思想异端》，载《众妙之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无上秘要》卷四二，《道藏要籍选刊》第十册，第143页。

提炼出经世治国的主张，考察其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正负效应，以获取有益的启示；从正邪相参、鱼龙混杂的道士和方士中，追寻其对帝王政治生涯所作出的消极的或积极的影响，以期更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概貌，并揭示道术迷信误国误身的危害，这乃是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又颇具难度的课题。

当然，要对这一课题进行系统研究，远不是几本小书可以说清的，以作者浅陋之学识及绵薄之力量，欲从事这样的研究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是，道家、方士在中国政治史上正反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以及人们对它的种种误解，又激起我探索、写作的热情和勇气，使我大胆地在底气不足的情况下啃咬这枚硬果。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探索只能是极粗略和极不成熟的。我殷切地期待着方家同仁的批评与指正。

目 录

序.....	方克立 (1)
前言	(1)
绪论(上)	
——道家的治国之术.....	(1)
一 《道德经》的社会管理思想	(2)
(一) “圣人处无为之事”	(2)
(二) “少私寡欲”，“知止知足”	(3)
(三) “不以知治国，国之德”	(3)
(四) “善用人者为之下”	(4)
(五) “反者，道之动”	(5)
二 新道家对早期道家政治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7)
(一) 对于“道”这一范畴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继承	(8)
(二) 对于虚静无为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9)
(三) 对于道德刑法等问题的认识	(10)
(四) 对于节欲崇俭、柔弱不争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1)
三 道教学者对道家政治理论的阐释和发挥	(13)
(一) 道教尊奉老子的原因	(13)
(二) 道士杜光庭对老子治国之术的阐发	(15)
(三) 诸道书对道家治国之术的继承和发展	(22)

绪论(下)

——方士、道士的神学思想及方术对王朝政治的影响	(27)
一 方士、道士的神学思想和方术的主要内容及其渊源	(27)
二 方士、道士的神学思想和方术对王朝政治的影响	(33)
(一) 封建统治者利用神权以维护其统治	(34)
(二) 神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皇权	(37)
(三) 进步政治势力利用神学、方术与腐朽的当权者进行斗争	(42)
三 方士、道士影响王朝政治的诸原因	(43)
(一) 方士、道士的神学理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43)
(二) 方士、道士的理想追求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欲求	(45)
(三) 方士、道士的方术异能为其干政开辟道路	(46)
(四) 统治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促使其求助于方士、道士	(46)
(五) 统治者需要借助神灵以补其自卑感或失落感	(47)
(六) 宗教氛围更助长着崇道之风的蔓延	(48)
(七) “以神道设教”的传统思想促使道教渗入上层政治	(48)
新道家的厄运与秦王朝的衰微	(50)
一 吕不韦与黄老新道家	(50)
二 仲父对秦王的规劝	
——《吕氏春秋》养生治国一理的思想	(53)
(一) 君主纵欲则身夭国亡	(54)
(二) 君主擅权用智则伤身危国	(55)
(三) “精气郁”则身病，“国郁”则政危	(55)
三 分权宣言	
——《吕氏春秋》对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的抨击	(56)
(一) 贵公去私	(57)

(二) 君道“贵因”	(58)	
(三) 罚过诛暴	(59)	
四 吕氏其人其书的厄运与秦王朝的衰微	(61)	
方士的活动与秦帝国的崩溃	(65)	
一 秦为水德	——五德终始说与秦始皇严刑峻法国策的确立	(65)
二 秦始皇的求仙活动	(70)	
三 秦始皇对仙的渴求而导致对人的杀戮	(73)	
四 方士与亡秦风暴的掀起	(75)	
黄老之术与汉初政治		(79)
一 崇尚黄老的社会诸原因	(79)	
二 黄老政治的积极作用	(83)	
(一) 除烦去奇	(84)	
(二) 轻徭薄赋	(85)	
(三) 敦朴节俭	(86)	
(四) 宽律弛禁	(86)	
三 黄老政治的消极影响	(87)	
(一) 促使诸侯王势力膨胀	(87)	
(二) 助长富商豪强横行	(88)	
汉武帝为何选择董仲舒		(90)
——方士的思想与董仲舒的出台	(90)	
一 汉武帝尊儒的社会历史背景	(91)	
(一) 儒家的《公羊春秋》理论保全了汉武帝的皇位	(91)	
(二) 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92)	
二 汉武帝策问贤良的主要目的及中心议题	(94)	

三 儒学能回答汉武帝所提的问题吗?	(96)
四 言符命、灾祥是巫和方士的本行	(98)
五 董仲舒从巫和方士的思想武库中搬来了武器	(100)
六 董仲舒新儒学的思想实质	(103)
汉武帝对神仙方术的迷信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107)
一 效法秦皇，过而无不及	
——汉武帝的求仙活动	(108)
二 由仙药和方士引起的悲剧	
——淮南冤狱起因试析	(113)
(一) 淮南王刘安谋反事件质疑	(113)
(二) 史籍中关于刘安谋反事件的记载破绽甚多	(114)
(三) 神仙信仰与方士的活动乃淮南之狱的导火线	(116)
(四) 淮南王谋反之罪证——“书节印图”考	(121)
三 由迷信鬼神方术而引发的家国惨祸及其转机	
——巫蛊之祸及汉武帝的悔悟	(123)
(一) 巫蛊之祸及其政治背景	(124)
(二) 高寝郎托梦上言与汉武帝的悔悟	(130)
谶纬的泛滥及其思想归属	(134)
一 谐纬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134)
二 谐纬的思想归属	(140)
(一) 纬书中真正与儒经相关的内容不多	(140)
(二) 纬书的主要成份是占星术	(142)
(三) 纬书中的神仙鬼神信仰在道教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	(144)
(四) 纬书中的医学理论和人副天数思想来自方术	(147)
三 谐纬依附儒经的原因	(149)

(一) 封建统治者推崇儒学	(149)
(二) 儒生需借助灾异说和谶纬以获宠或进行政治斗争	(152)
(三) 方士为求生存和发展需将谶纬依附于儒经	(154)
谶语、道教与李唐王朝的崛起	(158)
一 星占、谶策与诛暴代隋政治势力的兴起	(160)
二 谶语、道士与李渊集团的建功立业	(164)
三 道士们积极助唐的原因	(168)
四 道士与唐初统治者配合默契	(171)
贞观君臣对道家思想的运用及其社会效果	(176)
一 慎动兵革	(179)
二 轻徭简政	(181)
三 抑情损欲	(184)
四 谦退去智	(186)
五 贞观君臣遵循道家治国之术的社会原因	(190)
唐玄宗的崇道与唐王朝的盛衰	(195)
一 唐玄宗崇道的社会历史原因	(196)
(一) 谨守柔道，安身避祸	(196)
(二) 符瑞、占术推动着李隆基发兵诛韦	(197)
(三) 占术与李隆基的登基	(199)
二 崇道之策与开元、天宝盛世的到来	(203)
(一) 借托梦兆，起用姚、宋	(203)
(二) 对道家治国之术的崇尚	(204)
(三) 玄宗的以道治国	(206)
三 崇道与唐王朝的衰微	(213)
(一) 崇信道术符瑞，神化老子	(215)

(二) 惰惰无为, 纵情声色	(218)
(三) 崇道与安史之乱的爆发	(219)
(四) 依托道术, 以度残生	(222)
道家、方士与宋初政治	(224)
一 方术、神学与宋太祖的登基和暴亡	(225)
(一) 宋太祖对于方术、神学的利用	(225)
(二) 宋太祖的“暴崩”与道士之言	(226)
二 宋初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与控制	(229)
(一) 黑杀将军下凡与道教的兴盛	(229)
(二) 宋初统治者对术士的控制	(230)
三 道家治国之术在宋初的运用	(232)
(一) 道士与君主谈治国养生之术	(232)
(二) 宋初的无为之治	(235)
宋真宗的崇道闹剧	(242)
一 宋真宗对道教神学的利用和尊崇	(242)
(一) 天书事件始末	(242)
(二) 封禅大典	(246)
(三) 赵氏始祖下凡	(248)
(四) 宋真宗的其他崇道活动	(249)
二 宋真宗君臣崇道平议	(251)
(一) 封禅等活动的客观历史作用	(252)
(二) 对崇道官员也应作具体分析	(254)
(三) 宋真宗对道家治国之术的崇尚与运用	(257)
宋徽宗溺道的社会恶果	(262)
一 宋徽宗对道教神学的溺信与利用	(262)
(一) 尊宠道士, 倡导收集、编写和普及道经	(262)